

編序

聖書在漢語語境使用中產生的激盪

一、本書目的

以「聖經在中國」為主題的著作在中外學界已出現了不少，近年出版的《牛津聖經在中國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更屬重量級百科全書式作品。¹本書不可能也不企圖作出類似的大規模嘗試，而是針對一個狹小但重要的課題來進行：在具體歷史場景中，聖經是如何在漢語基督教語境中被解讀和踐行，而且主要研究對象是本土使用者而非傳教士。

這固然屬於釋經學和基督教史的課題，但亦與處境神學和宣教實踐猶關。即或基督宗教各宗各派把聖經置於其神學的不同位置，但畢竟聖經作為信仰傳統中的正典，所具權威性在教義和實踐中皆不容置疑。可是基督教又是源於以色列民族的信仰，在第一世紀面向異邦世界擴展時的思想中產生，輾轉在不同語境中傳播時，本土接收者如何理解和架接在自己的文化脈絡中，從來是神學與宣教中的重點問題。

1. K. K. Ye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Oxford: OUP, 2021); 其他如筆者編，《漢語基督教經學芻議》（香港：道風，2010）；Chloë Starr (ed.), *Reading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China* (London: T&T Clark, 2008); Irene Eber, Sze-kar Wan, Knut Walf, & Roman Malek (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Nettetal: Sankt Augustin, 1999)。

倘若從唐朝景教算起，漢語基督教一點不年輕，甚或比許多歐洲國家的基督教傳統更悠久，只是當中的起伏轉折未能造就一個能長期承接的本土群體，因此本書與景教相關的兩篇文章也只能針對所遺下的文獻作出評論。然而由四百年前的明末天主教開始，歷史告訴我們具影響力的本土社群已經生成，近年也引起了一些探究。雖然清代曾遭遇禁教，但新教各派後來也藉不同渠道入華，這當然包括軍事和經濟、技術和文化的影響，故帶來人們的注意、欣賞、爭議和評擊。這也僅發生在動盪的近百年間，漢語文化傳統遭逢巨大變遷，政治社會狀況完全位移，與世界各國和相應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傳統相遇交流，也在重新建立自己，這過程仍在發展中。

相對華人社會中的其他宗教文化傳統來說，漢語基督教並不強大，歷史當然也較短絀，卻處在上述巨變的夾縫中。她如何在不同張力中作出回應，尤其針對基督教正典和傳統的閱讀、本土文化傳統的承傳，以及當下面對的踐行要求，不單是漢語基督教社群自身的重要議題，也是宣教神學、文化交流以至全球化現象中文明變遷一個可資考究的樣本。因此本書並不主要着眼於宣教士對聖經與傳統的詮釋演繹，而是針對漢語基督教本土承傳者的論述來展開，期盼從既有的案例中整理出一些值得學界繼續思考的議題。

二、本書內容

針對本書的目的，此選集按歷史時序收錄了十篇文稿，大概可分為五個範疇。以下除作出概覽外，也希望為讀者提供一些可供串連的線索。

1. 唐代景教

景教固然是最早來華的基督教傳統，但由於現存文獻有限，我們對其認識仍有待開發。但這也表明即或當時可能有本土信眾，也不具持久的傳承能力，因此我們只能從有限資源管窺當時景教使用聖經的情況。

〈一神論·世尊布施論〉乃景教現存文獻中較大規模的一則，過往經常被視為阿羅本之作，可是譚大衛從其神學用語，尤其「世尊」一詞力議，這作品所展示的應該是當時中土周邊教區一種處境化神學的嘗試，在傳教士一行人入華以前已經形成。從字面可看出，世尊本乃佛家語，雖主要用於佛陀，但也可指向尊貴者的敬稱。對比於聖經，我們清楚看見這在文獻中為一綜合性名號，指涉上帝的兒子、聖道和主，皆為對耶穌基督的指稱。以一個不同宗教文化傳統的現成述語用於耶穌身上，在基督教傳統中並不多見，也是現代歐美基督教難以想象的做法，顯出在古代漢語基督教的一種劃時代嘗試。

如此一來，在景教後繼者中間便可能有進一步的踐行，朱東華在《序聽迷詩所經》中便找到一種處境化閱讀的更大膽進路。他考究了塔提安 (Tatian) 和東方教會中的禁慾主義，並對比其中的聖經譯文發現，《序》文大膽按所承接的傳統修訂了經文。從正統教會看來，這種把經文改變以適應一己看法的做法或許難以接受，甚或會被視為異端，可是卻為東來傳教士群體所踐行着，印證着基督教的多元統緒。當然，這是否影響了本土的信眾是有待探究的，但也可能是信仰群體歷久要面對的議題。

2. 明清天主教

這是最早肯定有較大規模漢語本土信徒，並作出具

明確信仰反思意向的時代。然而歷史卻告訴我們，有整部中譯聖經可供使用要待十九世紀初，新教來華傳教士的努力以後，故要理解此時代信眾如何解讀聖經不容易。正因如此，以往明清天主教研究多集中於傳教士遺下的文獻，但本土的漢語使用者卻才是信仰傳承的主體，也是本書欲專注探究的原因。正因沒有整部聖經可循，又有社會處境限制，很容易讓人想到時人會否因文化張力和為傳教之故，而過於適應當時主流的儒家傳統而削足適履，尤其士大夫要面對的是來自朝廷和民間的壓力。可是從王徵和張星曜兩個歷史案例，我們發現為適應時局而出現某種詮釋傾向是可能出現的，然而斷不能妄然認為當時信徒會輕率地扭曲聖經。他們除為儒者以外，都曾出入傳統宗教，尤其皆受佛教影響，故其作品裏也出現了補儒易佛的傾向，不過更重要的是檢視他們如何掙扎於東西傳統之間的歷程。

按孫尚揚的考究，王徵除了為個人安身立命的原因以外，信從西來教士的信仰也有其盡孝的意圖，這固然是儒家的核心之一，但它卻比較缺乏對他世的關懷，故如何事奉過世至親者的靈魂便成為問題。不過作為一位儒士，我們也不難發現王徵對聖經和基督教傳統不乏一些處境性閱讀，如他對上帝之愛的理解，主要是源於創造論而非基督論，着重的是人的內心和踐行上的回應，而非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捨身。這明顯與基督宗教的主流傳統有一定差異，不過這出現於活於其時的儒士來說，也是能夠理解的狀況。

與其相仿，張星曜的短贊同樣着重於創造論，他也對正義與果報有相似關注，這些似乎皆與當時的儒佛傳統有接連之處。但張海浩的研究表明，張星曜能心領神會從

西教士傳來的原罪概念，這顯然與儒家傳統大異其趣；他並掙扎於採納佛教的天堂地獄之說來闡釋信仰，這種活於多元傳統中的張力也是亞洲基督教歷來常有的現象。張星曜的著作雖然簡短，正是面對時人傳教需要而易於上口之作，展現出大部分信眾未能接觸聖經，卻活於不同傳統間的掙扎與取捨。

3. 清末民初

從十九世紀以降，整部中譯聖經雖然通過新教傳教士的努力而得見天日，但適逢中國社會和文化上開始出現巨變，晚清時中譯本也未有統一及標準，故面對大量的不識字民眾，更多信徒對聖經的認識可能是透過一些小冊子和教理問答等短篇而過於接觸經文本身，這跟明末清初仍有相仿之處。不過文化界在面對中西傳統的交流匯合，有識之士對聖經的了解也不一定源於教會，不少更是因與西來學問的接觸有關，甚至展現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這便跟當代的中國大陸語境有相似性。因此這重要的轉折時期，漢語基督教文獻中一方面仍帶有過往間接使用經文的情況，但愈往後的發展顯示，即使是教內學人也要面對文化適應和社會變遷的挑戰，而這也是對當下多元取向複雜性的預示。

司馬懿（Chloë Starr）從在五四時期小說的細緻解讀中，指出其中固然有如魯迅的《野草》和《復仇》等作品，把箇中主角的心理描述跟聖經故事以至耶穌的受難融貫起來，顯出教外作者對基督教信仰也有一定的認同。但也有許地山小說中的玉官，不單在個人經歷上顯出這位「聖經女人」性格上的曖昧，也反映出當時基督教在民間產生的正負面複雜影響。當然，這相對於郭沫若作品中針對當

時政局變遷中基督教的冷嘲熱諷，已經算是溫和的了。一世紀以後這種文化現象看來仍舊不絕。

面對文化界的這種狀況，溫司卡從五四一代的基督徒學人勾劃出一道光譜，描述他們在張力中提出視域融合的嘗試。陳崇桂、賈玉銘、吳雷川和趙紫宸顯然來自神學和社會上的不同位置，可是皆展露出在基督宗教和中國文化兩種傳統夾縫中綜合的企劃。他們希望把聖經視為漢語文典的一部分，並且這不獨是一種學人的思想遊戲，更要呈現出在社會中踐行的可能性。從文本到實踐正是要讓主體信仰能以存續的一個重要環節。

4. 當代大陸語境

從以上看聖經在漢語語境中的使用和踐行，當代中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着五四一代以至過往帝國時期面對的張力。基督宗教在許多人眼中即或已不是洋教，也仍非中土之物，卻又深刻地影響着西方以至全球文化的發展。雖然原則上中國不再有禁教，然而基於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官方論調，宗教典藉仍未能流通於大陸一般書店。可是又因聖經在文化中影響深遠，故許多坊間讀物也載有當中的故事和內容，這對於人們如何理解這經典與基督教信仰有密切關係。

楊富雷（Fredrik Fällman）的文章正反映出當代大陸社會中，註冊和非註冊教會、學界與政府等不同範疇的差異取態。官方和非官方教會在這方面的分別，除了跟政權的關係以外，某程度上似乎也可視為開放與保守的兩端。不過當城市化在近年大陸社會愈來愈加劇，普及教育成形以來，教會內外的知識分子中間也出現了多元立場，彷

如回到五四時期的熱烈狀況，如何可締造一種良性互動看來刻不容緩。

漢語基督教神學的出現固然也因此而起，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成為引人注目的學術運動。林子淳多年來專注於此一現象，指出此運動向來吸引着中外學者的原因之一，乃其主要參與者往往不具教會歸屬。然而不論其背景若何，倘所從事的乃基督教研究，則總不能繞過聖經作為正典的位置。如何在一個多元進路中發展出一種相互尊重，並能跟教內外思潮對話的路線便任重道遠，這也是教會與學界當下要面對的議題。

5. 面向未來

當代的所謂多元處境和不同的學術進路，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遙遠的事，即或信眾亦然。可是個人和旁人的信仰傳統和歸屬卻是明顯和親近的，而社會上政治和經濟等變遷，也塑形着民眾對事物包括宗教的看法。

雖然在東亞社會宗教林立，甚至可說是個諸經典並重的語境，但經文辯讀（scriptural reasoning）對華人基督教來說肯定是個嶄新的嘗試。不同宗教徒就着同一當下重要課題，從各自經典中選取經文作出對話，不但能讓參與者豐富對他者的理解，也是對自身信仰傳統的一種重新和更深入的認識，有助於在多元文化處境中共同面對迫切問題。福特（David F. Ford）是這種創意活動的倡議者，跟羅明嘉（Miikka Ruokanen）和李華偉近年在大陸學界合作推出這種大膽嘗試並作出了初步評估，值得作為一種實踐參照。

這種操作自然會引來一個歷久常新的問題：聖經作為一部古代經典對今人有何作用？即或它已在學術界被

經久深入鑽研，但可能僅被許多人視為一部古老傳統論著，因此如何在一個當代語境中展現出其價值，對漢語基督教來說便甚為迫切。謝品然作為一位東亞的聖經學者，多年來倡議釋經必須置於公共領域裏，並由此建立漢語神學。因此他表明聖經故事雖古，但其中所載的課題對今人面對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仍具智慧。

三、議題與致謝

從以上的內容概覽不難發現，不同時代的漢語使用者在援引和解讀聖經時都出現一些相似的困惑：一方面他們對新接受的信仰懷有開放性，對既有傳統中未有的概念顯出欣悅；但另一方面他們不可能完全脫離本有的文化脈絡，如何達致有效接收便必須產生一種架接。因此本文一開始已指出，這既是釋經議題，也關涉本土神學與信仰踐行，並且是在漢語的公共領域裏發生，漢語神學如何從中創意地建構出來是經久不衰的命題。

本書提供的是在漢語歷史語境中呈現的一些範本，它是普世的宣教神學和東西交流史的一個個案，但其中也展露了一些獨特性。首先，它的時間跨度很長，從七世紀的景教至今有一千三百多年，即或從明末耶穌會士入華計算也有四百多年，當中我們可發見以上所指出的共通卻變化着的主題。其次，由於這種長期性，我們看到漢語基督宗教的來源也是很多元的，不像一些地區的基督宗教由某單一宗派傳統主導着（在漢語基督教史中本有一些不同傳統的互動以至爭議，但本書篇幅所限不能承載）。再次之，接收方的文化也是十分多元多變，雖然儒家往往是主流，但佛道和民間宗教的影響向來不小，到了近百年西方思想、社會主義和政治經濟處境也帶來相當

形塑性。這傳送和接收方的雙重多元性，也可能是造成漢語基督教在當下難以說有主流傾向之因，並且似乎仍保存着不少的開放性，而這是也塑造着漢語文化傳統自身多變的一種近現代原素。尤有進之，因漢語基督教在傳統社會尚未定形，來到現代社會更同時面對教內外雙重的解讀與互動，這卻是歐美基督教歷史上較少出現的現象。即或有之，這也通常是教外對基督宗教貶多於褒的論述，但近年教外漢語學人對基督宗教採取欣賞態度卻屢見不鮮，這也是引發近年西方學者研究興趣的近因之一，並促成漢語神學當代的蓬勃發展。

因着這種背景和學術興趣，這選集一定程度上可說是承接着既有兩書的續篇：司馬懿編的《在中國閱讀基督教聖經》（*Reading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China*）和筆者編著《漢語基督教經學芻議》，²其中一些篇章也由其中逐譯或修訂再刊。這選集本蘊釀多時，原初計劃中有數篇已在《聖經文學研究》第十九輯出刊，但另一些因故當時無法面世。因此筆者後來便產生了出版此選集的意念，把原來計劃擴充，一些文稿選自《道風》等著作，由作者重修後再版，更感謝的當然是朱東華兄在本選集中的新著，故在此向作者們和各書刊出版社允准刊出致謝。當然，更要向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支持，尤其推動漢語神學的多年努力致意，共事多年的楊熙楠總監和本書編輯殷子俊使這選集得以出現心中銘感。基於這種和衷協作，我們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一幅較宏觀的圖像，從中可理解到漢語使用者在其文化語境中如何釋讀和踐行基督教聖

2. 兩書的出版資料參注 1。

聖書的激盪

經，盼有助綜合歷史經驗和面對當下問題來思考漢語神學的未來。是為之序。

林子淳

二〇二二年冬於墨爾本